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

李章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要]陈翰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或主持的系列农村调查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重要一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并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科学分析,并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业危机作一深切诊断;调查紧紧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陈翰笙农村调查的三个基本特点。

[关键词]陈翰笙;农村调查;特点;地位

[作者简介]李章鹏(1973—),男,江苏省兴化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2-0118-05 **[收稿日期]**2005-12-29

陈翰笙、毛泽东和张闻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三个典范,后两者尤其是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陈翰笙所进行和组织的社会调查,学术界却关注得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作一历史考察。

一、陈翰笙农村调查之概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所从事或主持的农村社会调查,主要有东北难民调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保定(清苑)农村调查、广东农村调查和河南、安徽、山东烟区调查,以及在陕西关中、汉中等地所作的一些简单调查等^①。此外,他还参与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前四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陕西省农村调查的设计工作。一直跟随他的张锡昌、刘端生等人则是有关分省调查团的主要成员,所以这四省调查的状况,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特点。

1929年夏,陈翰笙、王寅生等人到东北进行难民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文献的调查,他们依据东省铁路经济局的调查材料和一些档案资料、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等,写出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难民的东北逃亡》和《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三种调查报告^②。《难民的东北逃亡》主要反映河南、山东难民逃亡东北的过程及其悲惨遭遇^③。《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则说明田价、粮价、税捐和高利贷是造成东北农业经济衰落和佃农雇农贫困的原因^④。

不久,陈翰笙又组织开展了筹备期长达六个月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半年后,他复组团到保定清苑县进行调查。这两次调查均未曾有系统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⑤,但从事后的工作报告和参与者的回忆及一些研究文章,还是能够窥见其内容之一二。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由45人组成,用了三个月时间,挨户调查了22个村,对55个村的概况、8个市镇的工商业和1204户村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详细的了解^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多方面^⑦。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无锡的亩制和田权非常复杂,在被调查的22村内,至少存在173种大小不同的亩,田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竟达12种之多^{⑧⑨};无锡的土地比较集中,占农村户口6%以下的地主却占有耕地47%;在无锡,经营田产的地主比较少见,耕地被拆成小块分租给各个佃农,与此相应,耕地的使用也就非常分散。调查指出,田租租额高昂、赋税繁重、高利贷的压迫以及商业的极度不安,乃是当时无锡农村经济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也是造成无锡农业生产衰落的几个重要原因^⑩。

保定(清苑)调查,是由陈翰笙领导的社会学组和北平社会调查所联合进行的,但实际上完全按照陈翰笙所拟定的计划来运作^⑪(P173-174),并吸收了无锡调查的经验。调查团由66人组成。与无锡调查相仿,普通调查员募自本地,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组长不兼调查员。保定(清苑)调查团依据农

①调查的结果分别为《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12月)、《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2年12月)等。另外,陈翰笙还根据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王聪之的调查表整理出《山西的农田价格》(《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2月)。

②陈翰笙:《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版),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均未能找到。

③事实上,这两次调查均有报告,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参见秦柳方的说法(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和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一个初步成果。

作水利把清苑全县分成四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分作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及农户四种情况抽样调查。分别注重分配、生产、交换和消费等不同环节^[6]。调查团共对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此点与无锡挨户调查不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9]。内容主要集中于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口职业收入,以及全县和几个集镇的概况等方面。结果表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里,不过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比较多样,有分租、粮租、钱租等三种,而以钱租为主。租额较高,约占农业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也比较普遍。此外,农民所受商业上的剥削也愈来愈严重^[4]。这些情况所揭示的,都是以前的学术研究中所不太关注的。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陈翰笙受聘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组团到广东从事调查活动。在半年的时间内,调查团对广东16个县的农村经济概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农户作了挨户调查,同时进行了50县335村的通信调查。依据这些调查材料,陈翰笙先后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中文)和《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英文)两种研究报告。这两种报告,在内容、观点没有大的不同。调查资料表明,广东土地高度集中,集团地主的势力要大于个体地主。这里,地租繁重,捐税苛杂、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横行。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佣工工资也十分低廉,壮丁大批离村,妇女被迫出来耕作。这就造成,“有可耕的土地而不耕;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的不良状况。陈翰笙认为,这便是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所在,而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乃是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10](P124)}。

如果说上述几个调查,考察的主要是中国农村内部的生产关系,对中国农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关注得很少,那么1933—1935年的河南、安徽、山东烟区调查^①,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陈翰笙选定英美烟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作为切入点,实地调查了127个村庄的概况,对其其中6个典型村和429个农户的调查尤为深入。依据调查所得资料,他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草种植者生活研究》一书^②。该书翔实地记述了美种烟草引进中国的具体过程,及其对烟农经济的影响,形象地刻画了国际垄断资本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农民的真实情况,很有说服力。

二、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特点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单个看来各有特色,但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从总体上看,

这些调查具有三方面共同特点:一是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科学分析,并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业危机作一深切诊断;二是调查紧紧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三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

这三个特点实际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问题。阶级分析是陈翰笙计划、组织调查和整理分析调查材料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也是其研究生产关系的根本方法。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如何直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

陈翰笙调查的内容当然并不局限于生产关系,但他的调查均以生产关系作为考察中心,这点从前文对其主要调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此前他在工业地区上海杨树浦的调查和此后在民族地区西双版纳的调查,也都是以生产关系作为考察中心的^{[6][11](P45)[12]}。1931年,他更是公开地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进而提出了自己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较为具体的看法:“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13]当然,陈翰笙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东北难民调查中,他并未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问题的核心;在稍后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已有了这一看法。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至迟到广东调查时,他已经把这一看法贯彻到调查中。

在调查中,陈翰笙还始终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意图通过调查,分析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发现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有证据表明,至迟1930年保定调查时他就依据经济地位将农村住户划分为五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14](P7)}。今天有论者说,无锡调查就已将农户分为五类^[9],这种说法似不十分妥当。1934年,陈翰笙撰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时虽已使用五种农户分类法分析无锡农村,但这已是无锡农村调查四年多后的事了,期间他的观点很可能经历了一些发展变化。相对于《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文,参与这次调查的廖凯声在无锡调查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廖凯声并未提到这五种农户分类,相反,他提到了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区分^[3],所以,那种声称无锡调查时陈翰笙就已将农户分为五类的说法,尚需更多的证据。

陈翰笙有关五类农户分类法是依据农户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作出的,是一种阶级分类法,而依据租佃关系、雇佣关系或农场面积大小则存在其他不同的分类^{[14](P6-7)[15]}。将农户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不仅是陈翰笙个人的分类法,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对农户的基本分类法。早在1927年6月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实为中国共产党

①这次调查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问题调查委员会1933年关于生活水平研究丛书出版计划的一部分。

②上海别发洋行1939年出版,同年由国际太平洋学会在美国纽约出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陈绛的中译本,书名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控制)一份调查报告^[16]中,五类农户分类法就已呼之欲出。但这一报告还只是一个简单的调查统计,最早用这种分类法对农户、对农村经济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恐怕要首推陈翰笙了。陈翰笙在保定调查中不仅对农户作了五类区分,而且提出了分类标准^{[14] (P7)},而毛泽东直到1930年的寻乌调查时才提出了初步的划分标准^{[17] (P105)},到了1933年10月才有了更为明确的分类办法^{[18] (P127-129)}。因此在经验研究中确定阶级分类标准,不能不说是陈翰笙的一大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陈翰笙的分类标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保定调查中,他提出了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兼顾的标准。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前四省调查中,他又提出了富力与租佃关系兼顾的标准^{[19] (《凡例》)}。而在广东农村调查中,他则提出了“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10] (P96)}的分类标准。此后,中国农村派^①继承并在实际调查中广泛地应用了广东农村调查确定的分类标准。

经过无锡和保定调查,陈翰笙对中国社会性质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的社会。”^[20]又经过广东和烟区调查,他对中国社会性质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指出:“凡是研究过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那种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21] (《引言》)}

陈翰笙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调查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他又受聘于中国国民党控制的学术组织,其调查的结果一时间也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引用。这是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较为明显: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派都在争论中国的社会性质如何^{[22] (P57,59)},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社会性质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当时并没有暴露出这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分析社会的方法,所以,中国国民党不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对之一概加以反对;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也急需探明当时农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陈翰笙采用西方经验研究和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力求客观地反映社会事实,其所揭示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土地分配不均、农村金融枯竭、帝国主义的剥削等,也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又有客观数字作依据,应当说,都是不乏说服力的。

为了了解当时全国生产关系的情况,在调查中,陈翰笙还采取了分区进行的办法。他选择了无锡、保定、广东这三个调查区域。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地方,陈翰笙曾回忆说,是因为这些地方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很快,了解它们,“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

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11] (P46)}这无疑表明,他作为一个出色调研者所具备的独到之处。

三、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地位

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地位,首先应该放到中国社会调查史上上去估量。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中,陈氏曾从生产关系角度批评北洋政府农商部、金陵大学卜凯、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的调查。如他批评卜凯时就说:“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6]在《中国的农村研究》一文中,他更对当时几乎所有的农村调查都提出了批评:“直到现在,中国的农村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13]由此可见其自身的定位。

应该说,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生产关系,并进而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一调查套路,乃是陈翰笙农村调查区别于他所批评的对象的本质特征。其农村调查以比较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中国农村无论南北虽有程度差异,但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里的事实,说明了阶级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国际垄断资本剥削互相勾结是造成普通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社会动荡和农村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如此,各单个调查还揭示了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现象,比如广东农村调查发现集团地主的势力要大于个体地主;与无锡农村相比,保定的土地集中程度偏低,佣工现象较为普遍,地主经营土地的现象也比较多;保定农民交租形式以钱租为主,这也是其与无锡不同的地方;等等。关于土地经营方面的一些具体特点,陈翰笙以外的其他调查已有发现,但揭示农村中阶级差别的存在及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则是陈翰笙调查所特有的。卜凯的调查与陈翰笙的调查无疑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说,前者毫无是处。相反,卜凯的调查代表了一种着重农场经营管理的调查套路。它从微观角度阐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的农场规模所具有的不同的经营效率,从宏观角度揭示了中国各大农业区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及其对当地农户经济的影响。这些都很有价值。此外,在陈翰笙调查和卜凯调查之间也有某种联系,它们都是一种经验性研究,都力求以客观的数字表述中国农村经济现象,事实上,它们都是公认的水平较高的、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

关于陈翰笙与毛泽东农村调查之间的区别,法国汉学家毕仰高指出,毛泽东的调查是材料搜集型的调查,里面有更

①在农村性质大论战中,论战的一方是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因它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主要宣传阵地,所以被时人称为中国农村派,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所以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方以王宜昌、王毓铨和张志澄等为代表,经常在《中国经济》上发表文章,因而被称为中国经济派,与中国农村派相对,又被后人称为“托派”。

多的革命宣示,而陈翰笙调查则是解释型的调查,具有较纯的学术性质。相比之下,陈翰笙的调查所提供的数据的客观性要比毛泽东的强^[23]。应当说,毕仰高所言不无道理。但这种差别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是不能过分夸大的。

陈、毛两者的调查都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都以生产关系分析为中心内容,这显然是其彼此重要的相同方面。其差异在于,他们所从事调查的具体目的有所不同(此点正如毕仰高所指),具体方法也有所不同。陈翰笙更多地依赖于西方经验研究的方法,而毛泽东则较多地使用座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事实上,陈翰笙的调查也存在着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在美国发表的那本广东农村调查报告中,他就明确宣告改良主义是“幻想”,中国要“开展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21](《引言》)只不过他的政治性表达得更隐晦罢了。

简而言之,陈翰笙在中国社会调查史上的地位,就是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与西方经验研究相结合分析、了解中国农村实情的途径,他与毛泽东、卜凯等人调查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实际上都由此决定的。

其次,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地位,还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中的过程中去考量。

陈翰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的社会调查,不仅名闻一时,而且还由此带出了一大批著名的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秦柳方、薛藻鼎等人,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薛暮桥便一直声称自己“受业于陈翰笙”^[24]。在当时的农村性质大论战中,中国农村派论敌张志澄,也把上述这些人直接称之为陈翰笙的门徒^[25]。

通过调查,陈翰笙寻找和总结了一整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概念,并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这些均为其“门徒”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从这些人后来所单独从事的调查中,陈翰笙的方法和观点,都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和发展。

在中国农村性质大论战中,出于论战的需要,陈翰笙的“门徒”们将他原本比较零散的观点、研究方法、套路进行了归纳总结。这种归纳总结,反过来又有利于其观点的进一步传播。当时,参加归纳总结工作的有孙冶方、薛暮桥和钱俊瑞等人,其中,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一文堪称这项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该文中,钱俊瑞开宗明义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要研究土地问题就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1)中国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与性质;(2)中国现存各个地权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3)农业经营方式;(4)租佃关系。其中,第三点农业经营方式又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发生的影响,农村的市场结构受生产者控制还是受商人们支配;②农业经营面积的消长和农业成本的构成(农业成本集约的程度,农业成本的有机构成);③农村中雇佣劳动的成分。除了土地问题之外,还应研究与土地问题息息相关的

民族问题及农业恐慌的问题^[26]。

由于农村性质大论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陈翰笙等人的观点在民国时期就已为许多人所熟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观点更被反复写进教科书,得以在全国普及。

综上所述,今天有人将陈翰笙称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27],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除了上述两方面应有之地位外,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在社会功用方面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经验性研究,它无疑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客观认识;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它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在农村性质大论战之中及其后,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当年的农村性质大论战,基本上是在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和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之间展开。论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用何干之的话说,就是“现在试任意执住一些肯和实际问题接近的青年,问他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想除了极少数头脑已经硬化的不算外,一定会回答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22](《序》)。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社会影响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也正因为他将社会性质的考察作为其做调查的终极目标,陈翰笙的调查又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较强的局限性。相对于民国时整个社会调查的广阔性而言,陈翰笙的调查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不免显得过于狭窄。尤其是后来,调查的范围是愈来愈窄,最后甚至只局限于那些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事物中,其他事物对于他及中国农村派来说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如在钱俊瑞看来,生产力的研究同生产关系相比,就只处在“从属的、辅助的、初级的”^[26]地位,这就太过于单薄和狭隘了。

调查内容上的这种局限,最终也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如在广东调查中,陈翰笙就只注重耕地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而忽略了其他很多重要的方面。本来,富农与中农、贫农在广东所拥有和使用的耕地都一样的非常零细,且在使用的耕地中也都有一部分是租进的^[10](195—95)。这显然表明存在的问题实际已不仅仅是耕地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了,人口总量与有限的耕地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同的经营模式等,都可能是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而陈翰笙却抓住一点就不及其余了。

而到了钱俊瑞等人那儿,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来,将生产关系具体化是生产关系研究深入的需要,但如操作不好,也会造成偏颇,以偏概全。如钱俊瑞将商品经济研究仅仅规定为研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剥削关系^[26],就极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商品经济的研究范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了广度,也就没有了深度。当再观察他们以后发表的那些商品经济研究的文章时,其中的结论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就绝非偶然。在这里,可以看到了有一种将生产关系教条化的倾向——研究商品经济时不研究商品经济本身,而只研究生产关系。

更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派还集体表现了一种排他的倾向,往往将自己称为是科学派,而斥他人为“正统派”或庸俗派^[28]。在这点上,只有孙冶方表现出某

种不同。孙氏将各种调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研究,如工场管理、农场管理学、统计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等等。这种区分虽仍保留了高下之别的价值判断,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其他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显得相对科学和理性。

[参考文献]

- [1] 陈翰笙,王寅生.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J].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1932.
- [2] 陈翰笙. 难民的东北流亡[J].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1930.
- [3] 廖凯声. 社会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J].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8期,1930.
- [4] 秦柳方,陈道.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J/OL]. 人民网,2005-08-19.
- [5] 陈翰笙,等. 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的亩[J].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1929.
- [6] 陈翰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M]. 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
- [7] 陈翰笙. 现代中国的土地[A].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C]. 1937.
- [8] Yung - 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 - 1949[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雷颐.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J/OL]. 神州思想文化网.
- [10] 陈翰笙. 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A]. 陈翰笙,等.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C].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 [11] 陈翰笙. 四个时代的我[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12] 陈翰笙. 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3] 陈翰笙. 中国的农村研究[J]. 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1931.
- [14] 张培刚. 清苑的农家经济(上)[J]. 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1936.
- [15] 读者问答[J]. 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
- [16] 土地委员会. 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J]. 中国农民:第2卷第1号,1927.
- [17] 毛泽东. 寻乌调查[A].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8] 毛泽东.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A].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 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陕西省农村调查,河南省农村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20] 陈翰笙. 中国田地问题[J]. 农业周报,1930(41).
- [21] 陈翰笙. 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的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22] 何干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 上海:生活书店,1937.
- [23] Lucien Bianco. Mao's Views on Peasants (1912—1949) [R]. A Report on Mao Re - evaluated——A conference to mark the 110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ao Zedong and honor Stuart Schram for his signal contribution to Mao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ec. 5 - 7, 2003.
- [24] 于光远. 陈翰笙风云三世纪[J]. 炎黄春秋,2003(12).
- [25] 张志澄. 中国农村之富与贫——略评晚近中国的农村研究和农村调查[J]. 中国农工季刊,1935(1).
- [26] 钱俊瑞. 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J]. 中国农村,第1卷第6期,1935.
- [27] 余玮,陈翰笙. 用了108年脑筋的“中国经济首脑”[J]. 生产力研究,2004(4).
- [28] 薛暮桥.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复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J]. 中国农村,第1卷第11期,1935.

A Historical Survey of Chen Han - shen's Investig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1920s - 1930s

LI Zhang - p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 series of country surveys presided by Chen Hansheng in 1920s and 1930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country investigations. They quite promoted the course of Chinese - Characterization of Marxis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They took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modern China. Scientifically studying social nature of China and diagnosing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which engulfed the entire country by accurate investigations, investigating closely centering upo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using methods of class analysis were the three basic features of Chen Hansheng's surveys.

Key Words: Chen Han - sheng; investig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